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替换关键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月度数据解读（**2019** 年 **7** 月）[①]*

[①] 本报告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团队集体研究成果，执笔人为张杰。本报告基础数据均来自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国家统计局以及 Wind 数据库等。本报告为初步研究成果，欢迎讨论和提出批评意见。

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替换关键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导因素，是国内结构性矛盾和全球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叠加作用结果，其中，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遭受的内外结构性矛盾是核心因素。当前，导致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中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和风险以及突出的机制体制障碍。事实上，缓解、对冲和遏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因素，关键在于经济新动能对旧动能的替代规模和替换速度这两个重要维度因素。

当前，迫切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新动能规模相对过小”和“新旧动能转换速度相对过慢”这两大突出现象，导致中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面临突出的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因此，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替换的关键期，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诸多改革举措，特别是进入纵深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愈加聚焦于促进制造业部门经济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既要注重促进新动能规模的加速扩大，也要注重加快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和替代速度，过于缓慢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并不利于中国经济中高速高质量增长模式的形成和稳定。

对此，我们的基本分析结论是，一方面，可能中国的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0%及以上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才有“企稳”甚至“反弹”的基础，经济下行压力才能得到最终的有效遏制。但是，2017年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15.7%，离理想目标仍有较大的距离，这就表明中国经济近期仍然会面临相当大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2016年到2017年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GDP比重，只增加了0.4个百分点。这种现象意味着，中国经济中的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达到理想状态的30%，按照这种调整和增长速度，可能需要35.75年，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增长的现实要求，因此，我们看来，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年增速的合理区间应该是2%-4%，这应该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改革政策体系的核心目标。

在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风险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的总体改革调整原则是：中国各级政府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改革举措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要更加聚焦于推进和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新旧动能的转换和替代。从各级政府的政策举措和改革发力点而言，要将打造“新型举国体制”和“竞争中立”相融合相结合的新型政策组合体系，调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

从短期政策角度来看，在我们看来，近期中国仍有调整和降

低基准利率的空间，但是，我们认为，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如果基于促进制造业部门新旧动能转换的角度，针对制造业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要优于降低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加大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和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政策，要优于政府财政资金补贴政策。

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部门“降成本”政策的有效性，必须依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政府规模性行政成本的根本性改革路径，重点是要降低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适度收缩政府治理层级和政府行政机构规模、激发政府官员行政效率和主动创造能力。特别是建议要前瞻性研究和稳步压缩甚至取消乡镇政府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举措，建议逐步采取将公务员队伍压缩三分之一和提高公务员收入并行的重大改革举措，通过将政府官员权力的标准化、市场化和效率化，来倒逼和适度收缩政府官员规模，从降低新政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渠道来取得降成本的制度性持久效果。同时，针对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中蕴含的巨额高质量投资需求以及巨量创新研发投入特征，加快构建内在需求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

一、对处于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替换关键期的中国宏观

经济的基本判断与分析

第一，当前，导致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和风险以及突出的机制体制障碍。事实上，缓解、对冲和遏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因素，关键在于经济新动能对旧动能的替代规模和替换速度这两个重要维度因素。

非常直观的逻辑是，**一方面**，依据我们的研究分析，可能在中国经济中“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占 GDP 比重达到 30%以上规模时，经济新动能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主导型支撑力量，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方可在根本上具备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中国经济中“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占 GDP 比重的增速，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筑底企稳”甚至“回暖反弹”状态能否及早发生的重要条件。如果新经济新动能占 GDP 比重的每年增速，能够达到一个理想门槛状态，稳定处于一个合理区间，那么，这也是决定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能否出现“筑底企稳”甚至“回暖反弹”现象的重要条件。

第二，当前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中“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尚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且，从新经济新动能的替代规模和转换速度来看，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替代过程相对滞后和替换速度相对过慢的重大现象，这是导致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相对不足的核心因素。

一方面，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和《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核算方法》，2017年中国经济中“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为15.7%。这与理想状态的30%门槛还有相当长的差距。而且，中国不同区域中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存在极大差异性，不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中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低于15.7%，而东部地区则高于15.7%，甚至北京、深圳、杭州、上海等特定区域的比重已经超过40%，高的达到60%。这就表明，中国不同区域发展新经济和推动新动能转换的要素禀赋条件和营商环境，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复杂性以及机制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另一方面，2017年中国经济中“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相比2016年提升了0.4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增速来计算的话，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要从2017年的15.7%提高30%甚至更高比重，则需要35.75年。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增速的提高能力，已经出现了相对不足的突出现象。

第三，当前阶段，第三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替代的主导力量，然而，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部门，对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替代的推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激发，这是造成近期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关键因素。

从区分产业的角度来看，2017年中国第三产业中“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8.4%，超过第一产业的0.7%，也超过第二产业的6.6%。其中，从2017年相比2016年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新经

济新动能占 GDP 比重降低 0.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提高了 0.1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三新”经济增长迅速，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 14.1%，比同期 GDP 现价增速高 2.9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三新”经济增加值为 54253 亿元，低于第三产业的 69326 亿元。2017 年第二产业中“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低于第三产业 1.8 个百分点，而且，从 2017 年相比 2016 年的角度来看，第三产业中“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增速，是第二产业的四倍。

表 1　中国“三新”产业经济增加值核算结果

产业	绝对额（亿元）		相当于 GDP 比重（%）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三新”经济	129578	113587	15.7	15.3
第一产业	5998	5830	0.7	0.8
第二产业	54253	48497	6.6	6.5
第三产业	69326	59260	8.4	8.0

依据我们的思考和分析，针对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的

基本判断是，中国当前经济下行趋势尚未到达“筑底企稳”的关键转折点，短期之内仍然呈现和存在“波动式”继续下行探底的压力和风险。造成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中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仍然处于“旧动能占主导地位，新动能支撑作用不足”的特定过度阶段。

从造成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核心因素来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日趋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造成中国的对外出口压力加大，但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相对健全和完善的产品链、产业链生产体系优势，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能力和出口优势的影响相对有限且可控。现阶段，在第三产业发展态势总体呈现相对稳定的情形下，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核心因素，就主要体现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中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和风险，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部门的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构建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机制体制性障碍。客观事实是，只有当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中，所蕴含的以先进生产设备更新、新产品开发和自主创新研发投入等主导的大规模高质量投资能力以及增加值创造能力，得到充分激发和有效释放时，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才能得到相应的有效遏制和对冲。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速度和成效，决定了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筑底企稳”时机的发生以及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形成路径。

当前，迫切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新动能规模相

对过小”和“新旧动能转换速度相对过慢”的两大突出现象，导致中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面临突出的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因此，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替换的关键期，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诸多改革举措，特别是进入纵深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愈加聚焦于促进制造业部门经济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既要注重促进新动能规模的加速扩大，也要注重加快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和替代速度，过于缓慢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并不利于中国经济中高速高质量增长模式的形成和稳定。

对此，我们的基本分析结论是，一方面，可能中国的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30%**及以上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才有“企稳”甚至“反弹”的基础，经济下行压力才能得到最终的有效遏制。但是，**2017** 年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只有 **15.7%**，离理想目标仍有较大的距离，这就表明中国经济近期仍然会面临相当大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2016** 年到 **2017** 年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只增加了 **0.4** 个百分点。这种现象意味着，中国经济中的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 **GDP** 比重要达到理想状态的 **30%**，按照这种调整和增长速度，可能需要 **35.75** 年，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增长的现实要求，因此，我们看来，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增加值占 **GDP** 比重每年增速的合理区间应该是 **2%-4%**，这应该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改革政策体系的核心目标。

二、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是决定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核心因素

（一）当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下行压力仍然突出，下行趋势短期内难以根本性逆转，这是造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和风险的核心因素。

第一，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整体增长乏力、增长动力不足，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核心因素。

最为直观的一个判断依据是，图 1 显示，自从进入 2014 年以来，中国 GDP 同比增速，由 2014 年第 4 季度的 7.2%逐步下滑到 2019 年第 2 季度的 6.2%，与此同时，规模以上工业部门增加值同比增速，由 2014 年第 4 季度的 7.0%逐步下滑到 2019 年第 2 季度的 5.8%。二者的下行趋势和波动特征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同时，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始终高于工业部门，而且，一直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

2019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分季度看，2019 年第 1 季度同比增长 6.4%，第 2 季度增长 6.2%，第 2 季度比第 1 季度下降 0.2 个百分点。其中，分产业看，2019 年第 1 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第 2 季度为 5.8%，下降 0.3 个百分点。而 2019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仍然维持相对高水平增长态势。这就深刻表明，当前阶段，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下行态势，是中国经济整体下行趋势的决定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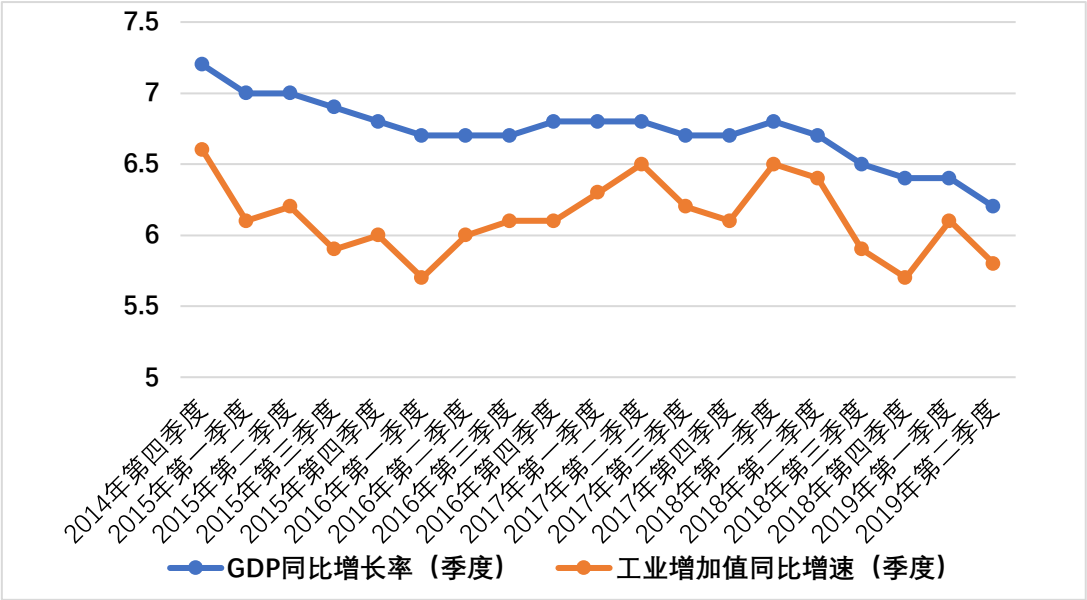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 GDP 同比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季度变化趋势

第二，工业部门增加值增速虽有反弹，但增长动力基础仍不稳固，始终存在波动式下行压力。2019 年 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3%[①]，比 5 月份加快 1.3 个百分点。但是，2019 年 1-6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5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68%。1-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其中，6 月份制造业增长 6.2%，较 5 月加快 1.2 个百分点。6 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7.1%，比上年同月下降 0.8 个百分点。

更为细致的角度来看，主要特征是：（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国有企业增加值增长动力相对较弱**。从区分注册类型角度来看，6 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股份制企业增长 7.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1.8%；私营企业增长 8.3%；（2）**东部和西部工业增加值增长动力相对较弱，东北**

① 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

地区增长动力相对不足。从区分地区角度来看，6 月份，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 6.1%，中部地区增长 8.5%，西部地区增长 7.9%，东北地区增长 4.3%；（3）**行业间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化加大，多数行业增加值增长乏力**。从区分行业角度看，6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6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2.5%，纺织业增长 1.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5.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9.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3.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2.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6%，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5.3%，汽车制造业下降 2.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14.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1.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0.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6%；（4）**产品间增加值增速分化加大，多数产品增加值增长乏力**。从区分产品角度来看，6 月份，605 种产品中有 339 种产品同比增长。其中，钢材 10710 万吨，同比增长 12.6%；水泥 20986 万吨，增长 6.0%；十种有色金属 490 万吨，增长 5.7%；乙烯 166 万吨，增长 11.9%；新能源汽车 14.3 万辆，增长 50.5%；发电量 5834 亿千瓦时，增长 2.8%；原油加工量 5370 万吨，增长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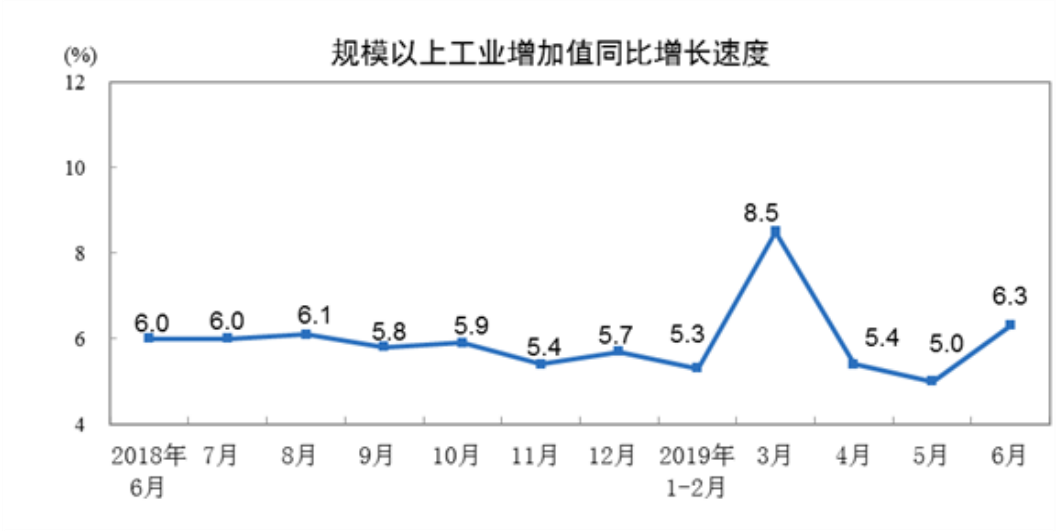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部门增加值同比增速月度变化趋势

第三，规模以上工业部门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呈现持续下滑态势。2019 年 1—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3790.2 亿元，同比下降 2.3%，降幅比 1—4 月份收窄 1.1 个百分点。其中，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655.6 亿元，同比增长 1.1%，4 月份为同比下降 3.7%。

更为细致的角度来看，主要特点是：（1）**制造业部门利润总额同比增速下滑尤为明显**。1-5 月份，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19519.4 亿元，下降 4.1%；（2）**工业部门营业成本上涨趋势相对过快，导致营业收入利润率下滑**。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发生营业成本 35.10 万亿元，增长 5.4%；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72%，同比降低 0.43 个百分点；（3）**国有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大幅度下滑，股份制企业利润微弱增长，私营企业利润较大幅度增长**。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342.3 亿元，同比下降 9.7%；股份制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16993.1 亿元，增长 0.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775.8 亿元，下降 8.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072.7 亿元，增长 6.6%；（4）**行业间利润增速分化程度加大**。1—5 月份，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15 个行业减少。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4.0%，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7.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5.9%，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3.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12.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7.4%，纺织业增长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2.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51.3%，汽车制造业下降 27.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22.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13.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 13.0%，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 9.4%，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 3.7%；（5）**工业部门货款拖欠程度加大**。5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30 万亿元，同比增长 4.5%；产成品存货 41944.9 亿元，增长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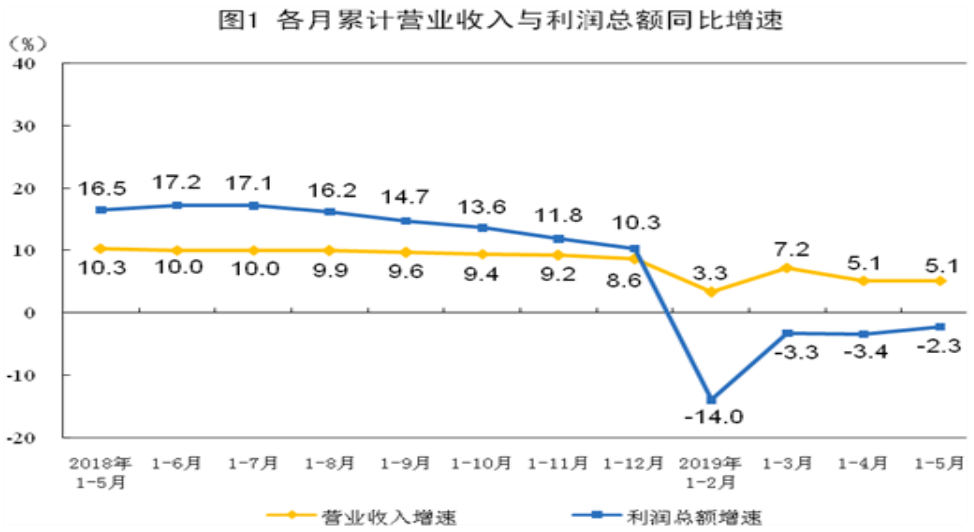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各月累计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同比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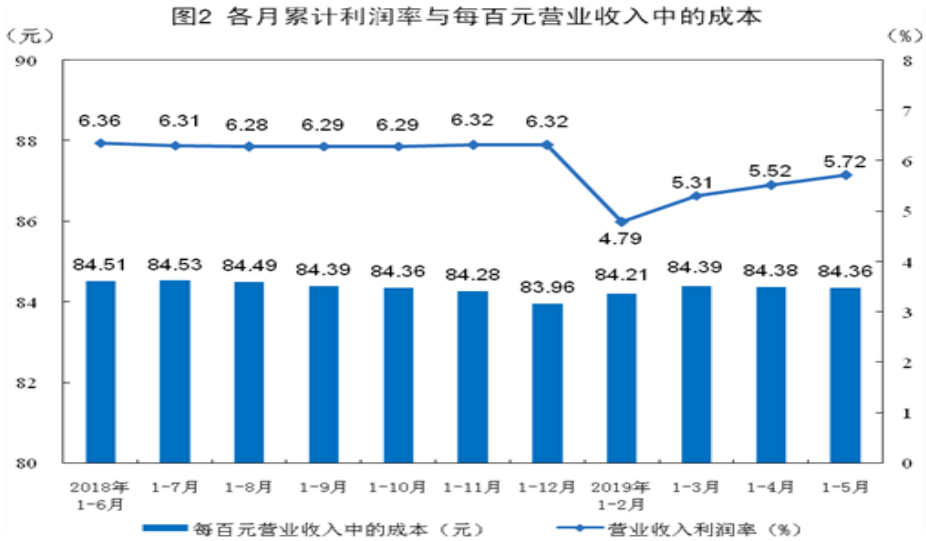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各月累计利润率与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第四，工业部门投资低位波动，制造业投资动力整体相对不足，亮点在于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态势良好。2019 年 6 月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3%，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3%，增速比 1-5 月提高 0.3 个百分点。其中的亮点是，1-5 月份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5%，增速比 1-4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 12.3 个百分点。

从更为细致的角度来看，主要特点是：**（1）多数制造业行业部门投资动力整体相对不足。2019 年 1-6 月，**农副食品加工业投资同比增速为-7.4%、食品制造业（0.4%）、纺织业（-0.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9.3%）、医药制造业（8.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4%）、金属制品业（-5.2%）、通用设备制造业（2.8%）、专用设备制造业（7.2%）、汽车制造业（0.2%）、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10.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8.1%）、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8.5%）；（**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态势良好**。2019 年 1-6 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0.4%，增速比全部投资快 4.6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4.2%，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 9.8%，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 8.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3.5%，增速比全部投资快 7.7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 65.7%；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业投资增长 36.3%；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 27.1%；（**3**）**民间投资增速小幅回落，表明民间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民间投资的活力仍未充分激发**。2019 年上半年，民间投资 180289 亿元，增长 5.7%。其中，1—5 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5.3%，增速比 1—4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2.7%，增速提高 0.9 个百分点。

第五，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低位徘徊，工业部门供大于求的失衡关系局面逐步凸显。2019 年 6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持平，环比下降 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0.3%，环比下降 0.1%。2019 年 1-6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0.1%。

更为细致的角度来看，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价格下滑是工业生产者价格持续下滑的主因，表明生产资料部门的供需关系失衡现象更为突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 0.3%，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22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4.5%，原材料工业价格下降 2.1%，加工工业价格持平。

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9%，涨幅与上月相同，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23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2%，衣着价格上涨 1.6%，一般日用品价格上涨 0.5%，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 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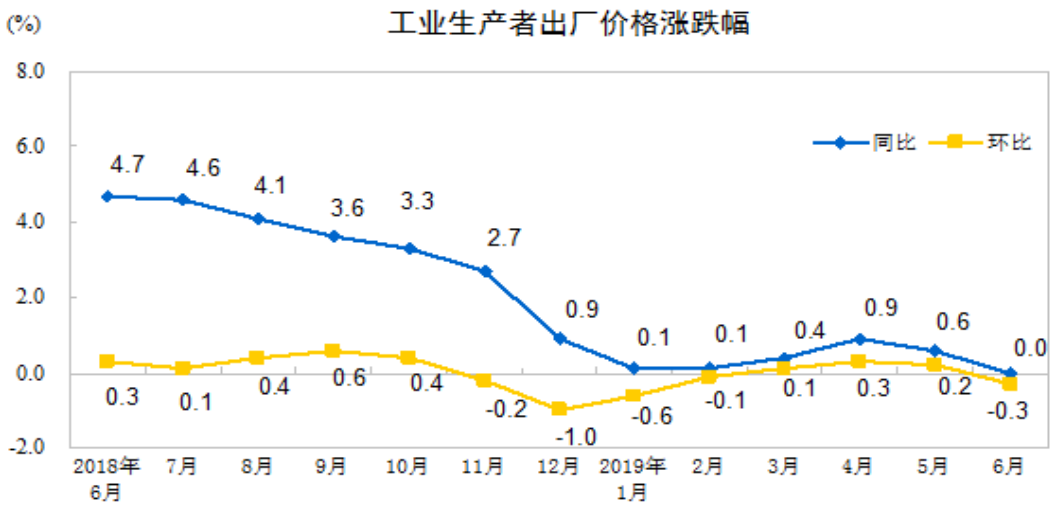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各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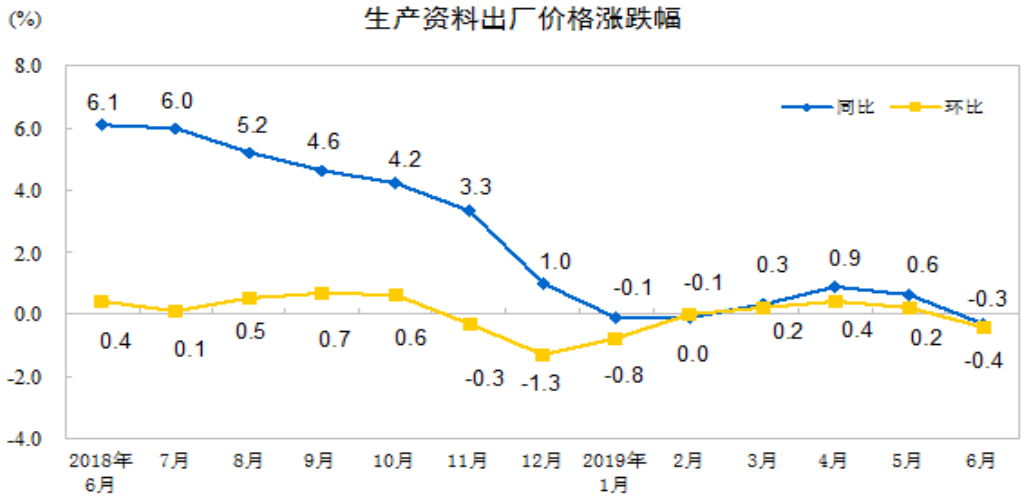

图 6　中国各月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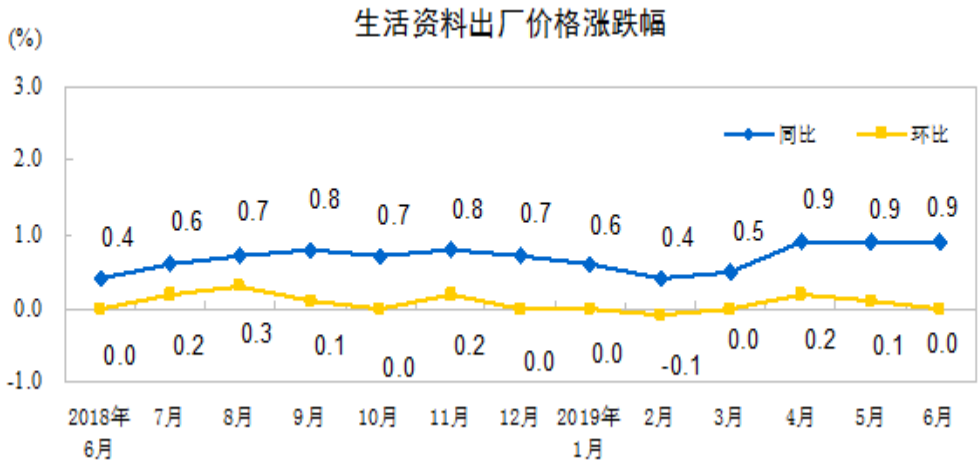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各月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的变化趋势

第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总体上仍然处于收缩区间，近期反弹动力不足。国家统计局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6 月份数据与上月持平。6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49.4%，制造业景气水平与上月相当。**其中，大型企业的 PMI 下滑趋势尤为明显**。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2019 年 6 月的 PMI 为 49.9%，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 2019 年 6 月的 PMI 为 49.1%和 48.3%，分别比上月回升 0.3 和 0.5 个百分点，景气度有所回升。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6 月份录得 49.4，低于 5 月 0.8 个百分点，这是四个月来首次落于荣枯分界线以下，表明中国制造业景气度明显下降。在中美贸易摩擦未见缓和的背景下，新订单总量和新出口订单皆有所下滑。其中，新订单总量出现今年以来第二次收缩，但幅度尚属温和；而在 5 月刚恢复增长的新出口订单则重现下降。

从更为细致的角度来看，主要特点是：（1）**生产总体保持扩张态势，新经济新动能部门扩张趋势明显**。生产指数为 51.3%，虽比上月

回落 0.4 个百分点，但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3 个行业的生产指数位于扩张区间，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位于 54.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的生产指数为 55.6%、53.3%和 52.2%，环比均有所上升，且分别高于制造业总体 4.3、2.0 和 0.9 个百分点。生产景气度呈现稳中有升，表明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中高端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2）在中美贸易摩擦未见缓和的情形下，出口市场订单增长动力偏弱**。新订单指数为 49.6%，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其中，反映外需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6.3%，低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3）微观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预期相对基本稳定，波动幅度较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3.4%，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8 个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位于 60.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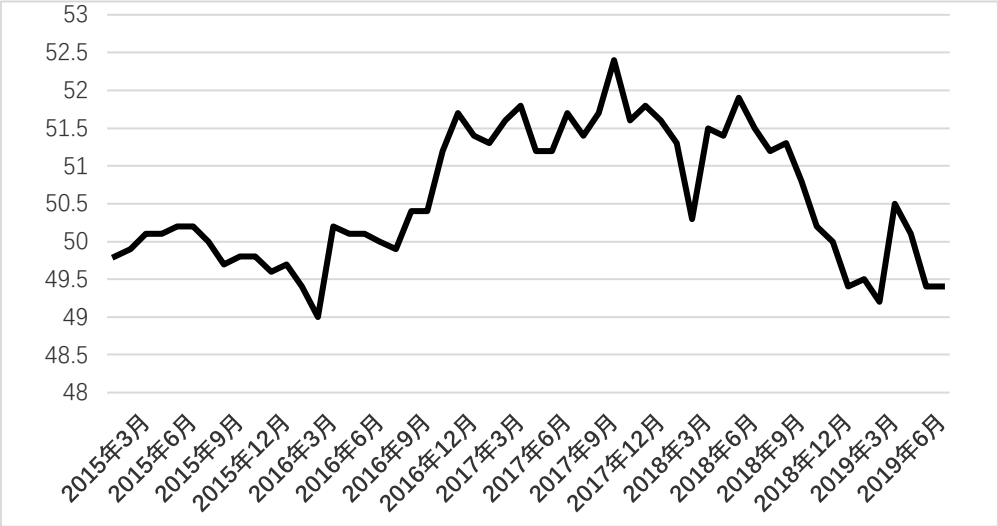

图 8　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 月度变化趋势

图 9　财新制造业 PMI 月度变化趋势

第七，中国出口动力仍然相对脆弱，近期内增长动力不足。2019 年 1-6 月，货物进出口总额 146675 亿元，同比增长 3.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2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79521 亿元，增长 6.1%；进口 67155 亿元，增长 1.4%。从贸易方式角度来看，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5.5%，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9.9%，比上年同期提高 0.9 个百分点；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5.3%，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8.2%。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1.0%，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41.7%，比上年同期提高 2.7 个百分点。6 月份，进出口总额 25619 亿元，同比增长 3.2%。其中，出口 14535 亿元，增长 6.1%；进口 11083 亿元，下降 0.4%。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58361 亿元，同比增长 4.2%。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0555 亿元，增长 1.9%，增速比 5 月份加快 1.2 个百分点。

然而，从以美元计算的角度来看，2019 年 6 月份出口再度负增长，6 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1.3%（前值 1.1%），重回负增。6 月份在海外主要经济体中，美、欧、日制造业 PMI 均继续回落，表明中国出口主要市场的经济环境依然趋弱，这必然会抑制中国出口的整体外需。

从更为细致的角度来看，主要特点是：**（1）一般贸易出现了出口增速回落重大现象**。从贸易方式看，6 月份一般贸易（-1.5%）出口增速回落，而加工贸易（-4.8%）出口增速跌幅收窄；**（2）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出现负增长。**从产品类型看，6 月劳动密集型产品（1.7%）出口增速较 5 月重新回落，机电产品（-1.6%）和高新技术产品（-2.1%）出口同比增速也再度转负；（3）多数**重点出口商品出口增速回落。**6 月集成电路（13.1%）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4.4%）出口增速回升，而手持无线电话机（-20.9%）出口增速大幅回落，或与贸易冲突、部分商品限制有关，此外，服装（-3.0%）、纺织（-3.4%）、家具（-4.7%）等出口增速亦回落；**（4）对美国、欧盟、印度等主要**

出口地的出口较大幅度回落。从国别和地区来看，6 月中国对美国（-7.8%）出口增速再度回落，对欧盟（-3.0%）出口增速从 5 月的 6.1% 大幅下滑转负，对日本（2.4%）出口增速小幅回升。新兴经济体中，对印度（-5.5%）、中国香港（-8.2%）出口增速回落，对东盟（12.9%）、韩国（3.0%）出口增速改善。

（二）总体来看，当前阶段，虽然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起到主导作用，而且，贡献率一直处于增加状态。2019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4.9%，比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 15.0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60.3%，高于第二产业 23.2 个百分点。**然而，无法忽略的基本事实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仍然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增长动力偏弱，这是导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中国经济短期内能否实现“筑底企稳”的关键因素。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升级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培育与构建，更是维持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状态和高质量增长路径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当前，中国第三产业部门中以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为主导创新模式的新经济新动能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然而，基本事实是，第三产业部门中经济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难以完全替代工业部门中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作用。从第三产业的发展阶段和内在规

律逻辑来看，基于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模式创新的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可以实现独立式的发展格局，但是，正由“相互孤立增长模式”逐步过渡到“相互支撑型发展模式”或者“相互依赖型发展模式”，即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互动性和相互支撑性逐步加强。客观事实是，第三产业的增长最终无法脱离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内生需求和派生需求的硬性约束，必然会遇到增长“天花板”效应。

我们对此逻辑判断的依据是，随着中国工业部门生产景气指数的持续低迷，必然会逐步传导和制约第三产业生产景气指数。由此，可以观察出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的下滑趋势。2019 年 6 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2%，比上月微落 0.1 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4%，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6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3.0%，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保持扩张，但步伐有所放缓。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1.3%和 54.2%，环比均有所回落，但幅度不大。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2019 年 6 月录得 52，较 5 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为今年 3 月以来最低。

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中新旧动能的加速替换和顺利转换，无论是从短期角度还是中长期角度来看，对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促进效应和塑造功能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和日显重要。

这主要体现在：

（1）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中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巨额固定资产，是短期内对冲中中国投资动力不足的核心因素，也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因素。

（2）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提升，所释放出的巨额创新研发投入，既是GDP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

（3）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是中长期内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图12显示，至少在2004-2018年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二者的差距一直比较相对稳定，且有缓慢逐步扩大趋势。在这种情形下，由于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拖累”效应，随着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中国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偏向第三产业，很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造成结构性“下拉”效应。因此，只有持续性地大幅度提高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抵消第三产业部门的相对较低生产率发展困局，方可持续提高中国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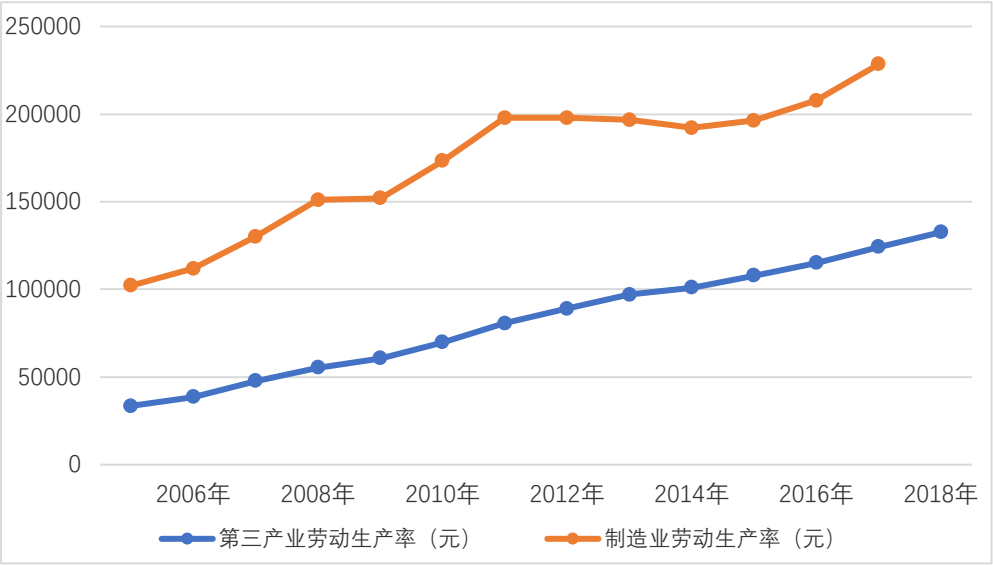

图 10　中国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4）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蕴含的工资增长空间以及未来的高人力资本就业岗位创造能力，这是中长期内影响中国内需驱动增长模式加速形成和激发中高端消费动力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图13显示，在2002-2018年间，第三产业的人均名义工资水平一直高于制造业部门的人均名义工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差距不仅没有呈现收敛趋势，相反，呈现出逐步扩大趋势。在我们看来，在中国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形下，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和机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推行的转型升级、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构建主导的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所蕴含和释放出来的工资增长空间以及未来的高人力资本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必然会从中长期内影响中国内需驱动增长模式加速形成，激发中高端消费动力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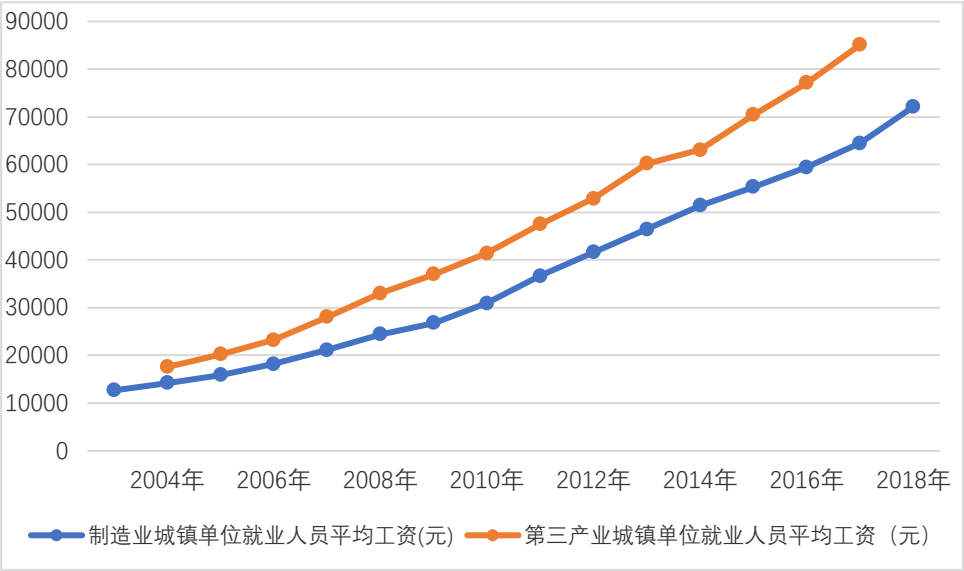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第三产业和制造业人均工资的变化趋势

三、当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替换中的九大问题和风险

第一，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一味沿袭和依赖政府扶持政策和各种隐性土地、税收优惠政策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动能虚假化现象和泡沫化现象的发生。

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推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一味依赖依靠政府财政资金直接补贴，或者主动实施各种隐性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利用各种隐性的土地优惠政策或税收政策，比如，土地出让金返还政策和税收财政资金后补政策，来招商引资高新技术企业和刺激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现象，导致了部分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虚假性”快速增长现象的发生，导致部分地区存在盲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泡沫的重大现象，造成部分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或新兴产业并不具有根植性和持续性，进而造成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的突出现象。客观事实是，

第二，在中央多轮环保督察行动压力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将关注力和精力放在如何应对上级的环保督察，对不符合环保法律要求的企业和产业，采取简单的“一代切”关停工厂方法，完全忽略了对积极发展绿色制造体系应有的推进工作责任，造成部分地区的产业断层和经济增长动力缺失风险。

在中央多轮环保督察行动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仅仅落在如何应对和满足上级政府的督察行为，对地区内不符合环保法律要求企业和产业，简单粗暴地“一刀切式”式的依法关闭工厂。而将环境保护和地方产业发展简单对立和割裂开来，对如何通过主动发展

绿色制造、绿色装备、绿色工艺等公共关键技术平台以及发展集中处理污染公共设施，来帮助和促进地区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意愿和能力严重不足。客观事实是，对于中国当前众多的不符合环保法律要求产业和企业而言，这些产业或企业生产的产品多数均是生产必需品和生产必需品，不可能因为现有的生产方法不环保就完全停止生产或从国外进口，最为合理的方法是，政府采取各种市场引导政策或财政优惠政策，来帮助和激励这些产业或企业研发和引进绿色制造、绿色装备和绿色工艺，或者针对特定产业特定公共关键技术平台采取政府支持策略，或者政府主动发展集中处理污染公共设施等方法加以彻底解决。

第三，部分县镇乡层面特别是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县镇乡层面减税降费政策出现了变异和扭曲现象，导致制造业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获得感有限，甚至部分地区有税费征收力度强化和征收范围扩大的趋势。

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县镇乡区域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县镇乡区域地方政府，在落实和实施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多数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口冗余和政府机构的螺旋式膨胀，所导致的长期处于吃饭财政状态以及巨额财政赤字压力下，地区征税的计划指标不仅没有调整，反而有提高的现象，造成征收范围持续扩大和征收力度过于严格，导致县镇乡区域的制造业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真实税收负水平担非但没有降低，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再加上这些地区中部分政府官员对自身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强烈诉求，造成巧立名目乱收费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相反，还有激化和蔓延的趋势，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区中小微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真实税费负担水平，严重削弱了中小微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获得感和出口国际竞争力，严重恶化了这些地区的营商环境，严重抑制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第四，民营企业对制造业部门中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动力尚未完全激活，相反，外资企业以及部分国有企业部门对高新技术部门的投资快速增长，这种此消彼涨的新格局，可能会造成部分地区的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正在逐步出现产业断裂断层困局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缺失风险。

2019 年 1-5 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3%，增速比 1—4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这就表明，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下，民营企业的投资动力，特别是对制造业部门中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动力尚未完全激活。在中央出台一系列“稳民间投资”和“稳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政策激励下，虽然 2019 年呈现一定程度的恢复性反弹现象，但是，仍然未呈现出可持续增长的稳定性特征。然而，对比来看，一方面，2019 年 1-6 月，中国吸收外资额 4783.3 亿元，同比增长 7.2%，增速比前 5 个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也显著高于去年同期 1.1%的水平。而且，中国吸收外资呈现逐月加速趋势。2019 年 6 月，中国吸收外资额达 1092.7 亿元，同比增长 8.5%，增速与 5 月持平。更为重要的现象是，外商在华投资战略布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从行业角度看，外资正加快向高技术产业以及高技术服务业加速集聚。2019 年 1-6 月中国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额同比增长 44.3%，占比接近 30%，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吸收外资额增速超过 70%。从地域角度看，外商投资正从东部沿海逐步向西部地区转移。2019 年上半年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同比增长 21.2%；另一方面，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 2019 年 1—5 月份同比增长 7.2%，仍然高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1.9 个百分点。这就深刻说明的问题是，在民营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民营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动力尚未完全激活的情形下，外资企业以及部分国有企业部门对高新技术部门的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此消

彼涨的新格局，在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大城市区域的情形下，在民营企业或中小微企业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县镇乡区域的情形下，这种竞争效应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部分东部地区、多数中西部地区以及县镇乡区域的产业断层困局和经济发展动力缺失风险。

此外，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在部分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现金流面临短期流转困难以及经营状况出现暂时性困境的情形下，出现了“部分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化，部分地方国企被中央企业化”的现象，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民营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力，降低国有企业的资金配置效率，进而阻碍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构建。

第五，近期中央密集出台的促进营商环境改善政策，导致了营商环境改善程度在南北区域之间的差距绝对性扩大现象，导致了县镇乡营商环境改善改革严重滞后的突出现象，造成部分北方地区以及多数县镇乡区域的新经济、新产业和新动能发展基础条件和高端要素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重大现象，严重限制了这些地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

当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各地区营商环境改善的改革政策，然而，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中国各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程度，在这一轮改革政策的作用下，出现了两个重大现象：一方面，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和政府行政干预相对较低的南方区域，营商环境的改善程度得到显著提升，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得到显著提高，而在中国的北方区域，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思维根生蒂固，官僚主义行为仍然盛行，导致营商环境的改善程度相对低于南方地区，甚至出现了二者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中央出台了一系列

营商环境改善改革政策，目前只能在地级市层面得到相对有效实施落实和监督执行，而在广泛的县镇乡层面区域却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和督察。这就必然造成中国的部分北方地区以及广泛的县镇乡层面区域的新产业、新经济和新动能发展，面临基础制度条件和高端要素供给能力严重不足重大现象的叔父，严重限制了这些地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机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造成“腾笼换鸟”过程中“旧鸟”腾退了，而“新鸟”却招不来的发展困境。因此，营商环境在南北区域的巨大落差，在核心城市和县镇乡之间差距的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存在显著差异性的核心因素，也是导致中国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不均衡以及不同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第六，各地兴起的公募私募投资基金以及各种形式的天使基金风险基金，甚至各地政府设立的各种形式的产业引导发展基金，出现了扎堆投向特定新兴产业或特定要素优势产业中特定企业的新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干预和扭曲了这些产业和企业的市场公平竞争机会，导致了投资的错配效应以及特定企业的垄断效应，从长期来看，这并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中国各地兴起的公募私募投资基金以及各种形式的天使基金风险基金，甚至各地政府主动设立的各种形式的产业引导发展基金，出现了扎堆甚至盲目投向具有政府优惠扶持政策密集型的特定新兴产业或具备特定要素优势产业中特定企业的新现象，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各级政府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引下，各种形式的公募私募投资基金和天使基金风险基金，以及各地政府设立的各种形式产业引导发展基金，均一窝蜂地扎堆投向这些新兴战略产业中的竞争领先企业，这些竞争领先企业在获得额外的

政府优惠补贴政策和金融机构多重投资后，自身产能规模和市场占有份额快速扩大，利用自身的政策低成本优势和额外获得的规模经济优势，造成特定的产业垄断性竞争优势，对产业内其他正常经营企业普遍造成极大市场冲击，严重干扰了产业内的正常市场竞争秩序；另一方面，大量公募私募投资基金和天使基金风险基金，以及各地政府设立的各种形式产业引导发展基金，专门瞄准那些具有特定资源要素的产业或企业（比如稀土产业），或瞄准那些特定产业和产业链中的“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企业，进行扶持上市操作，甚至依靠弄虚作假行为包装上市，这既会造成投资资金的错配效应以及特定企业的垄断效应，也会造成中国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中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国际竞争力不足。

第七，当前无法忽略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中国多数企业进入依赖自身创新研发投入来获取国际竞争力和持久生存核心竞争力的特定阶段，而企业自身创新研发投入在满足个性化、少批量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并不具有产业广泛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大批量产品的拉动效应，这就会导致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培育和提升，未必能够带来大范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支撑作用比较有限，从而导致新经济新动能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不足。

当前，我们通过对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以及深圳等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很多微观企业的确在努力进行“机器替代劳动力”、先进生产设备引进、产品质量提升以及自主创新研发活动，但是，这些微观个体企业的转型升级活动，在全球和国的消费结构日益呈现个性化、多样化、批量化的特定情形下，特别是在中国大批量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订单容易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挤压和分散以及制造

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的情形下，微观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活动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活动，只能带来企业自身的利润增加或创新利润的增加，而不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有效促进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带来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就可能造成的悖论是，即便微观企业层面发生了个体化的经济新旧动能导向的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然而，这却不能反映到整个产业层面或总体经济层面的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导致在总体层面中国创新对经济拉动效应停滞现象的发生。而且，在中国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主要是以商业模式创新导向的特定情形下，必然会面临“高劳动力成本病”或鲍莫尔指出的“高人力资本病”，最终导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程度有限甚至出现增长停滞的现象，这就又会进一步拖累中国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因此，我们担心的是，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占 GDP 的比重可能会在较低水平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跨越门槛，可能会在 30%的比重面临特定的阻碍效应，导致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增长出现“天花板”现象。

第八，无论是从加快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角度来看，还是从崔进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角度来看，各个层次的人才缺乏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东部和中西部广泛地区中产业和企业短期和长期发展的突出问题，这是阻碍中国众多地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替代的突出因素。

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对于那些迫切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而言，既普遍缺乏低技能劳动力，也缺乏专业性的创新研发人才、工程师和中高级技工，而对那些迫切需要发展壮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尤其缺乏高层次的创新研发人才、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开发工程师以及生产线上的中高级技工。显而易见，当前阶段，各层

次专业化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因素。而且，近年来中国多数地区房地产价格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近期多数城市房租价格的快速增长，已经迅速传导和推高了普通劳动力成本和高层次人力资本成本的快速持续上涨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生产成本的快速上涨，削弱了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出口竞争优势，抑制了中国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开创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并且，在那些人资资本密集型和创新研发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中，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房租价格迅速上涨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推高效应，对这些新经济新动能产业和企业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越是明显。

第九，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没有打破间接融资主导模式和银行主导模式，银行机构风险识别和监管机制没有得到突破性改革和根本性创新和的前提下，制造业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会严重阻碍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一方面，从通过“优化存量资源配置”途径，促进旧动能转型升级渠道角度来看，既需要在高端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工艺、关键材料等方面，实现自主创新式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全面突破，也要在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深度融合。特别是要通过“机器替代劳动”、“AI 替代简单流水生产线”等途径，促进传统制造业部门的产品质量全面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既来满足中国消费者收入提升和中产阶层规模扩大带来的消费结构向中高端升级，对高质量、个性化、多样化、创新性产品的需求，也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维持中国传统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低成本以及国

际竞争力。这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这些旧动能部门的各种形式的转型升级活动，均蕴含对长期投资资金的巨额需求，迫切需要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能够提供较低成本的长周期外部融资资金的支持。然而，中国既有的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在普遍遵循过度风险保守型的经营行为和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策略的激励效应下，无法从根本上满足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各种形式的转型升级活动所内涵和需要的各种外部融资需求，导致货币政策的商业银行货币创造渠道的阻碍和失效，导致利用仅仅利用宽松型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法解决金融资金无法渗透到实体经济部门的困局。因而，这就必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转型升级活动，制约了中国培育和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新兴地方产业集群战略目标的实施。

另一方面，从依靠“扩大优质增量供给”途径，促进新动能培育壮大渠道角度来看，在当前中国消费升级所决定的需求侧向高端化逐步转移升级的状态下，迫切需要在新的供需关系下实现新的动态平衡，关键就在于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和新业态，关键就在于推进“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特别是要针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促进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提升，从而实现供给侧的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因此，要在供给侧部门全面推行“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既要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前提下，全面提升和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自主能力，特别是要实现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也要在事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实现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全面突破，彻底解决制约制造业为主的新动能培育壮大的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桎梏。然而，无论是从是实现基础研究方面的全面突破，还是从实施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全面突破，或是从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开发研究、中间实验研究、工程化研究和商业化产业化等环节的转移转化过程来看，均需要各种前端后端的天使基金和私募投资基金、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型资本市场和全能制的商业银行体系接力式的、全方位的外部融资支持。相反，中国现有的以国有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以及过度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市场体系，根本上无法满足和匹配微观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这些成果向应用开发研究、中间实验研究、工程化研究和商业化产业化等环节转移转化过程中蕴含的长周期的、风险较高的巨额外部融资需求，因而，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供给侧部门中推进“制造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造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远远滞后于总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要求的重大现象。

在我们看来，在这些制度性的约束条件下，中央近期出台的解决民营制造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局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阶段民营制造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局，相反，中央的强压型政策以及行政命令指令式的干预策略，只会刺激地方中小银行管理人员通过各种隐性操作手段来满足上级针对中小微企业贷款数量的考核目标和考核要求，最终或许只能导致各级商业银行以及地方中小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攀升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客观来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逐步聚焦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的内在矛盾和改革困局，金融股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成败。而在供给侧已经不适应需求侧变化形式下，金融结构性问题和金融体制深度改革困局对需求则

的抑制效应也必然逐步暴露出来。因此，只有针对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体制进行“大破大立式”改革的前提下，针对银行机构的风险识别和监管机制和金融融资工具进行根本性、颠覆性创新的基础上，针对多层次、多样化和贯穿式的资本市场有效发展和全链条覆盖的金融监管体制得到有效构建的情形下，才能彻底破除困扰中国民营制造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满足中古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所产生的对长周期、高风险投资和创新研发资金的多样化需求。

四、下阶段的改革发力点和政策组合

（一）改革基本原则的调整与展望

近期，中国的改革政策逐步聚焦于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新旧动能加速替换过程，这集中表现在一系列组合政策文件的出台和政策组合效应。比如，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公布《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三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今年下半年将按中央部署，推动出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文件，进一步加强对专利商标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推进加大打击专利侵权行为的执法办案力度，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优势，严格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而且，目前，江苏、上海、山东、广东、浙江等地都在研究出台当地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意见，最快将于本月中旬陆续出台。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为本轮升级方案的重点。经开区将聚焦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打造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并推动形成产业集群等等。

然而，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是：一是这些政策的组合效应究竟如何？有没有形成政策的合力效应？二是这些政策的基层落实性和贯彻性如何？特别是在中国基层政府官员普遍存在“懒政、怠政、怕政”行为动机和激励机制的情形下，政策的基层落实力和执行力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且，针对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机制体制障碍，针对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内外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尤为需要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的组合策略，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重要的内外结构性问题和矛盾。

第一，中国各级政府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改革举措以及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发力点，要更加聚焦于推进和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新旧动能的转换和替代。从各级政府的政策举措和改革发力点而言，要将打造“新型举国体制”和“竞争中立”相融合相结合的新型政策组合体系，调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政策的核心，是要各级政府利用直接财政资金补贴或税收减免政策，瞄准扶持制约产业链和产品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方面，瞄准支持制造业企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提升方面；另一方面，“竞争中立”政策的核心，是要消除各级政府隐性的“所有制偏向”和“外资偏好”行为。针对民营企业在各级政府推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和环保督察行为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敏感问题，适度转向以强调“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主导的市场化原则。同时，要将鼓励绿色制造业上升为今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各级政府应积极加大制约行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环保技术创新、环保处理工艺和关键设备等关键共性技术方面的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和有效激励政策。

我们建议，当前最为紧迫的改革着力点应该是，全面清理清退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采取的以政府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特别是要逐步取消针对专利的各级各地政府财政资金的补贴和奖励政策，适度调整中国各级政府当前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要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建设任务，上升为总体层面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基础性制度环境的前提目标。在制度环境成本比简单要素成本更为制约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培育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情形下，要将中国各地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改革重点，落在对强化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和提高违法成本方面，落在约束和控制政府对市

场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以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落在构建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重点方面。

第二，对中国地方政府原有的政府主导和政策刺激型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模式，到了“大破大立”的关键时期，也到了机制体制改革的临界点。

正是由于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和把握的不到位，中国不少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各种产业政策和开发区政策，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模式的市场化发展方向，对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和扭曲效应。从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活动来看，在落实中央所部署的一系列落实和推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为内涵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国家发展战略进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仍然偏好于采用选择性产业政策和生产成本补贴型产业政策，偏向于采取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以及依赖各种开发区载体平台，导致了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同质化、产业低端化锁定、产业过度竞争、产能过剩以及微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动力缺失等一系列突出现象的发生，甚至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造成了“信息化泡沫”、“高新技术企业泡沫”乃至“战略性新兴产业泡沫”等现象。而且，也造成了新型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和创新基金的走样和变异现象。对通过加快推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仅不能起到预期的促进效应，相反，还可能会南辕北辙。产生无法忽略的多重负面作用以及破坏性效应。因此，全面清理和转变中国地方政府针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各种产业政策措施，对开发区以及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所附加的各种不合理政府功能和做法，到了彻底反思和转型的重要关口，对中国地方政府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式，到了“大破大立”的关键时期，也到了全面深入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

临界点。要真正扭转和改变中国地方政府以政府扶持为主导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模式，必须回归市场机制作为激发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动力活力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不可忽略政府的应有作用，找准政府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中关键薄弱环节的发力点，鼓励地方政府在加快推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重新认识和协调好“国家规划”和“地方特色”之间的承接关系，依据地区自身要素禀赋条件、经济发展阶段水平、市场机制发育程度的差异，探索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新经验、新模式、新机制。

第三，依靠加快建设法治体系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建议加快将“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全面引入到市场经济体系和现代法治体系的完善和建设。

中国于 2008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的反垄断法，并未直接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做出法律制度规定。反垄断法这一与身俱来的先天立法缺陷，随着中国反垄断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化以及利益集团的干扰，造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或限制竞争等各种垄断行为屡治不止，严重抑制了中国市场公平机制这个经济发展基础性制度的发挥。针对这个重大问题，2016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在各种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借以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毋庸置疑，国务院出台的这一《意见》弥补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缺失的反垄断短板，有利于纵深推进反垄断执法，但由于《意见》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很难在实践中真正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或限制竞争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和限制。因此，建议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修订核心内容，确立公平竞争政策在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

地位，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程序化、规范化，以法律的名义确保这一反垄断手段的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性，既有利于以法律的名义固化市场公平竞争审查的经验和成果，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法治体系在加快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中所具有的法治潜能。

第四，依据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中小微企业地位日益加强的新形势，加快推进以保护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为主要目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和专利法方面的重大改革。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要强化和完善针对“中国制造”的知识产权布局，围绕“中国制造 2025”的重点领域和“互联网+”行动的关键环节，形成一批产业关键核心共性技术知识产权。同时，在以智能制造、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互联网+”以及重构型商业模式创新（如分享经济共享经济）所主导的产业大变革时代，中小微企业必将是中国创新的主体，中国经济进入了大中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全面利用兼并并购高创新能力的中小微企业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的特定时代。这种情形下，制定针对激励中小微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以及强化保护中小微企业的巨额创新研发投入利益，既是符合中国现实国情，也是有极大发展价值的政策导向。对此，我们建议，一方面，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专利激励政策的调整方向，应该要特别针对中小微企业，鼓励中小企业研究开发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建议鼓励中小微企业在不经过特定专利拥有者许可授权的前提系，能够把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创造的专利转化为产业，这个中小微企业就可以拥有专利权的三分之一。因此，针对中国而言，抓紧研究和出台鼓励中小微企业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专利，转化为生产力和形成产业化成果，并且可以分享 20%-35%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

（二）近期可着力的短期政策

在我们看来，近期中国仍有调整和降低基准利率的空间，但是，我们认为，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如果基于促进制造业部门新旧动能转换的角度，针对制造业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要优于降低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加大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和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政策，要优于政府财政资金补贴政策。

第一，构建针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方面的新型政府财政扶持机制，重塑“新型举国体制”。

要优先制定和实施将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经费支出比重达到 10%以上的战略目标和相应的具体任务安排，特别是要全面持续性地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对原始创新、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高强度的直接财政资金支持。全面通过推行科技机制体制改革，加大对从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等前沿领域的高等院校和专业化科研机构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新型举国体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领域，率先放开和鼓励企业作为主体承担单位以及企业和专业化科研机构，联合申请国家各种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自然基金委各种项目等途径，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来激活和坐实各种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等。同时，适当调整和加大针对这些特定领域的政府采购范围和力度，从补贴需求角度而非生产角度，来贯彻政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支持政策。要优先在首都地区构建真正与专业化科学研究和科技前沿自由探索体制相匹配的科技管理治理制度，打造真正与专业化科学研究和科技前沿自由探索体制相匹配的财务报销制度，设计出真正与专业化科学研究和科技前沿自由探索体制相适宜的人才薪酬激

励机制，要将国家政府机构已经出台的各种科技管理制度精神的落实和细化，作为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第二，紧扣既有的不合理增值税制度这个痛点，当前在实施制造业部门实施加大减税力度政策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在特定领域和特定产业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特别是实施差别化增值税减税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落实“稳就业”和维持传统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双重战略高度出发，针对出口导向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尽快制定和实施较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的改革举措，建议将其增值税率调整为 8-10%。鉴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是构建在传统产业集群和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基础上的客观事实，针对处于产业链和产品链的配套环节的中小微企业，建议尽快将其增值税率也调整为 8-10%。

第三，构建针对不同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新型财政扶持和激励体制，设计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生产设备购进、创新研发投入、人才引进培养的新型财政激励政策体系。

针对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尤要强调打造大中小企业在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方面全面融合的创新共同体系，打造“国进民进”创新协同协作的新格局。一方面，将鼓励大中小企业按照创新链和产业链、产品链分工特征组团而成的创新共同体系，上升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各级政府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改革侧重点。特别要提高和强化针对创新型小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减税免税政策，激活小企业的创新自主能力，同时，针对按照创新链和产业链、产品链分工特征组团而成的大中小企业的创新共同体系，建议采用相应的增值税抵扣政策，降低中小联合创新的税负水平；另一方面，不要纠缠和束缚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谁应该在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中起到主导作

用的简单战略定位和狭隘思维范式问题，而应该着眼于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兴起以及全球主要国家创新竞争愈加激烈的情形下，通过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重点产业领域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方面，形成新型的协同合作体系，打造“国进民进”创新协同协作的新格局。既要鼓励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免费溢出，也要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主动深度参与到国有企业主导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体系，构建出具有全球创新竞争优势的创新共同体系。

加快培育和激励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培育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内在需求相匹配、相适宜的多层次人才体系。一是继续强化高等院校在基础学科、基础应用学科以及特定专业学科的人才培养规模，构建与中国当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中，重点产业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构建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相适宜的现代科学研究学科体系。同时，继续加大对职业技术学院的政府财政支持力度，鼓励职业技术学院的新型专业设置，适当重新布局和升级职业技术学院；二是建议继续降低各类金融机构员工的收入水平，适当拉平制造业和金融机构部门之间不合理的、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现象。通过改变对金融经济等“热门”专业高收入的不良预期，彻底扭转高等院校学生过度热衷和偏好与金融经济等“热门”学科的重大现象，强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生选择和从事科学研究基础学科、工程师以及技工相关学科学习的激励动机；三是加快设计和出台新型的技工分级制度，适度强化特定类型的技工认定分级证书制度，建议将工程师、技工等级与退休金的多少进行挂钩，将参加各种劳动者技能大赛所获得的各类工匠荣誉称号和退休金的多少进行挂钩。同时，从提高终身收入的角度来构建有效的收入激励制度。建

议可适当弹性延长高级科研人才、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退休时间。

（三）重点布局的中长期政策

第一，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部门“降成本”政策的有效性，必须依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政府规模性行政成本的根本性改革路径，重点是要降低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适度收缩政府治理层级和政府行政机构规模、激发政府官员行政效率和主动创造能力。特别是建议要前瞻性研究和稳步压缩甚至取消乡镇政府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举措，建议逐步采取将公务员队伍压缩三分之一和提高公务员收入并行的重大改革举措，通过将政府官员权力的标准化、市场化和效率化，来倒逼和适度收缩政府官员规模，从降低新政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渠道来取得降成本的制度性持久效果。

要将县镇乡区域地方政府的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与降低县镇乡区域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和适当压缩地方政府冗余功能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建议再次大规模实施镇乡政府合并的制度改革，尤其建议将县域中平均 30-50 个镇乡政府机构，按照地理经济中心辐射范围，合并压缩到 4-8 个镇乡政府机构。对于裁撤的镇乡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可采取提前退休以及政府提供转岗再就业扶持基金模式加以解决。

第二，要将深入金融体制改革摆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位置，要深刻认识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极端重要性。针对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中蕴含的巨额高质量投资需求以及巨量创新研发投入特征，必须加快构建内在需求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

首先，将全面引入和实施“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作为今后中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当前，仅仅通过所谓的精准定向

式的基础利率降低货币政策，或者通过各种行政命令指导以及各种局部的金融工具创新（比如，我们实地调查发现，银行机构的承兑汇票，就已经成为阻碍中小微企业融资和发展的突出问题），来鼓励银行体系对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政策，已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金融体系资金不愿流入进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难题和困局。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所遭受的融资难融资贵困局，背后反映出的是深层次制度性因素障碍，只能通过“壮士断腕”式的机制体制改革方可破局和化解。客观事实是，当前以遵循商业经营逻辑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益原则为主的银行体系，与制造业部门转型升级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诸多内在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到一个即将爆发的临界点，中国已经到了针对既有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体系，实施“大破大立”式改革的关键阶段。在我们看来，当前阶段，中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是要将“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全面引入和落实到金融体制体系的全程化改革进程之中。就此，今后主要的改革主线和突破重点是，一方面，要尽快打破国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真正推进以强调公平市场竞争机制为导向的银行体制改革，构建与市场化机制要求全面兼容的银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风险识别监管机制以及组织架构运行模式；另一方面，不要简单地认为一味发展民营银行或将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引入中国的金融机构，就可以解决中国银行体系乃至金融体系中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倒逼和促发中国金融体制体系的全面改革，进而就能有效鼓励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刺激金融工具创新。事实上，即便引入了民营性质的中小商业银行，只要没有“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的全面引入和实施，就无法有效解决中国金融机构的根源性问题，导致中国金融体制体系的

根本性改变。因此，优先加快实施中国金融业的“对内开放”，才能由表及里、从现象触及实质，真正激发股份制商业银行体系和各种金融机构市场化经营机制的构建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激励机制的确立。

其次，加快以构建全能制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性改革。必须将推进和实施中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定位为加快构建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培育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内在需求相匹配、相适宜的现代金融体系。无论是从促进以产品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导的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活动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以打造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以及精益制造生态系统主导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活动的角度来看，抑或是从以构建原始创新、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主导以及产学研深度融合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活动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均蕴含着巨额的高质量投资机会以及巨大的创新研发投入空间，特别需要以长期贷款期限和相对低成本为主要特征的金融体系来加以匹配，迫切需要以直接融资渠道主导的金融结构来加以匹配。然而，中国目前仍然是以银行机构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间接融资渠道为主的金融结构，这已经严重滞后于构建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多方面需求，既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活动发生了严重的不匹配现象，也与正在全面推进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发生了全面的不兼容现象，而且，这些不匹配、不兼容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固化特征以及路径依赖特征[3]。对此，我们建议，一方面，要使得金融体系真正对接和满足科技创新小微企业、传统制造业、高端生产装备企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对相对低成本的 5-10 年周期甚至更长时期的先进生产设备和智能制造设备更换的贷款融资需求，使得

金融体系对接和满足制造业部门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培育等所隐含的巨额创新研发投入需求，当前中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最优实施路径是，逐步取消针对银行机构直接融资功能的法律限制，尽快赋予和强化银行体系的直接融资功能，前瞻性地探索和构建全能制银行体系下的新型金融监管制度；另一方面，在充分借鉴德国的“主银行制”和日本的“实业财团+银行制”的综合优势基础上，可以前瞻性地探索特定的产业集团和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体系的联合控股和构建长期“互利共赢”式的新型融合发展模式，要将银行机构的盈利模式和盈利空间转化到覆盖和满足对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的不同融资需求特征方面，鼓励银行机构要从为企业或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形态的多样化、个性化融资服务，来获取自身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而非仅仅谋取企业或产业特定发展阶段的短期利润最大化。

再次，加快布局适宜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特征的、具有直接融资功能的专业化、地方化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体系。按照第五次国家金融工作会议指明的“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的基本精神，积极探索和发展具有直接融资功能的地方化、专业化的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体系。所谓的“地方化”，就是指这些地区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其经营业务范围应该被限制在特定地区之内，专门服务于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满足实体经济部门的各种融资需求，将自身的盈利空间和生存发展机会，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机会充分融合在一起，互利共赢，共生共长，所谓的“专业化”，就是指特定的中小商业银行，其经营业务范围应该被限制在特定产业行业，专门服务于满足特定产业和企业的各种融资需求，将自身的盈利空间和生存发展机会，与产业的发展机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直接融资功能的中小商业银行体系，就是指赋予地区性、专业性的中小商业银行的直

接融资功能，发展全能制银行式的中小商业银行，强化中小银行机构利用直接融资渠道对地区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撑功能。而且，针对积极探索和发展具有直接融资功能的地方化、专业化中小商业银行体系的既定目标，迫切需要前瞻性地研究和构建全能中小商业银行体系下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更为重要的是，要积极鼓励具有直接融资功能的地方化、专业化的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体系，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集团、本土跨国公司的相互融合发展机制和银企一体化机制，并前瞻性地研究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监管制度设计与创新。

最后，加快发展覆盖全产业链和创新链对接和融合体系的多层次、多样化现代资本市场体系。切实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强化提供长期期限贷款的这两大核心能力角度，来全面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转换，要将资本市场改革的着力点和金融监管制度设计的核心点，全面落实在构建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活动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相互匹配和相互支撑方面。一方面，认准和坚持发展股票市场对解决中国当前加快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根本性作用，不要受到股市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继续加快科技创新企业的新股发行速度。同时，遏制和消除企业在上市过程中的作假和腐败活动，加快健全股市的一视同仁退出机制。实现允许国外优质企业在中国国内股市上市的机制突破 [3]。特别是要打通股票市场和银行体系之间的资金流传通道，打通企业股权融资和银行直接投资渠道之间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特定的税收激励政策措施，彻底扭转各种形式的公募私募基金以及天使风险基金偏向于获取短期利益的操作行为和逻辑，鼓励公募私募基金以及天使风险基金投向和满足特定产业产品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融资需求，覆盖和满足在全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体系的各个对接环节的股权融

资、债务融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等多样化、全流程的外部融资需求。同时，积极扩大和提升上市企业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以及新三板、新四板，对从事关键产业、产品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工作的企业的优先上市权和再融资权。